

交易费用政治学:现状与前景

马 骏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与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 510275)

内容提要: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交易费用经济学开始被运用来研究政治领域的许多问题。虽然这一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但即使在英语文献里,仍然还没有研究者全面地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进行评估。本文先评述这个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然后,分析为什么交易费用经济学可以用来分析政治问题,并总结了交易费用政治学的贡献。最后,分析了交易费用政治学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交易费用 政治 制度分析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交易费用经济学开始被运用来研究政治领域的许多问题。1981 年,诺斯(North)发表了“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在此书中,诺斯开始关注制度的低效率及其原因,并建立了一个新古典国家理论,将交易费用视为一个理解国家行为的变量。1990 年,诺斯发表了一篇名为“交易费用政治学”(1990)的论文,标志着交易费用政治学正式诞生。在此之前,莫(Moe)和温加斯特(Weingast)就已经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运用来分析政治问题。和诺斯相比,他们对于政治学的影响更为直接。1984 年,莫发表了“组织新经济学”一文。他认为实证的政治理论主要关注社会选择的两个机制:投票与市场,而忽视了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即层级制。因此,他呼吁政治学家重视“组织新经济学”的研究。在他看来,既然组织新经济学对于理解私人领域的层级制结构作出了革命性的贡献,那么,它同样也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部门的层级制。不过,莫(1990)认为,虽然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角度,政治决策的环境和过程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政治权威是在非自愿的基础形成的,政治领域存在政治产权的不确定性。温加斯特(Weingast,1983,1984;McCubbins,Noll & Weingast,1987,1989)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国会与官僚机构的关系,挑战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官僚支配”理论。运用交易费用经济学,温加斯特和马歇尔(Weingast & Marshall,1988)分析了国会内部的组织结构及制度安排。

在这些先驱性探索的基础上,10 余年后,这个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文献,一个可以称之为交易费用政治学的领域实际上已经出现。交易费用政治学的很多发现大大地弥补了以前的以公共选择为主的理性选择政治模型的缺陷。因此,及时地评估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就非常重要。此外,虽然这一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但即使在英语文献里,仍然还没有研究者全面地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进行评估。因此在汉语文献中率先开始这种文献评估就非常有意义,这无疑会有助于推进我国政治学和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本文先评述这个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然后,本文分析为什么交易费用经济学可以用来分析政治问题,并总结了交易费用政治学的贡献。最后,本文分析了交易费用政治学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领域。

交易费用政治学的主要研究成果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由于交易费用理论的运用,很多政治学和公共选择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都得到了比较满意的解决。这些交易费用政治学的研究都集中于这样一个问题:政治交易中存在的交易费用问题如何影响政治制度设计?

理性的选民为什么选择投票?公共选择理论的投票理论认为理性的投票人应该不会选择投票,而会选择“理性的无知”。然而,在现实中,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选民都去投票,但是,相当多的公民都选择了投票。所以,正如阿德雷齐(Aldrich,1997)承认的,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者完全可以借此来推翻整个公共选择理论。1998 年,琼斯和胡德森(Jones & Hudson,1998)运用交易费用理论从投票成本的角度对公共选择的投票理论进行了修正,使得理性选择的投票理论能够解释投票行为。

琼斯和胡德森认为,对于投票人来说,评价政治候选人的政策陈述和个人人格的成本(搜寻成本或信息成本)

是非常高昂的,因此,投票人不可能评价关于候选人的政策和人格的所有潜在的“信号”。恰恰相反,理性的投票人极有可能会利用一个“最优”数量的“信号”来对候选人进行评估和选择。在这些信号中,政党身份是一个低成本和精确的信息来源。当候选人被宣布成为某一特定政党的代表时,一个低信息成本的信号就被提供给投票人。该信号不仅提供了关于政策取向的信息,而且还提供了关于候选人人格特征的信息。因为,在选择候选人时,政党组织者已经认真地审查了候选人的特征。所以,就象经济市场上的企业降低了运用市场的交易费用一样,政党就是政治市场上的“政治企业”,它降低了政治市场上的交易费用。此外,政党纪律也有助于克服政治家的机会主义倾向。虽然政治家的利益是短暂的,但从长远来看,政党的名誉是非常重要的。为了维护政党的名誉,政党会帮助约束政治家的“过度的行为”。总之,政党在投票人和该政党的代表之间提供了一个“隐性合同”,有助于降低政治市场上政治参与的交易费用,使得选民有动机进行投票。

政治委托人能否有效控制官僚机构? 20世纪70到80年代流行的政治学和公共选择中的官僚行为理论,无论是“俘获”理论还是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都是“官僚支配”的理论。它们都认为官僚机构有着和政治家不同的动机,而且在信息和专业知识上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官僚机构是不受控制的。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近年来兴起的“国会支配”理论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即政治制度能协助政治家控制官僚机构。国会支配的交易费用模型主要有两类:事前影响和事后影响模型(Huber & Shinn, 2000)。

事前影响交易费用模型强调在职的议会和政治家可以通过仔细地设计行政结构和程序来事前影响官僚机构的决策。对于事前影响模型来说,官僚决策的政治控制实际上是一个委托-代理问题,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是道德风险:官僚机构有能力选择和实行一些不同于政治委托人目标的政策;而且,政治委托人很难推翻这些政策。面对这种官僚机会主义行为,事后的惩罚一般是作用很小和效果很差的,因此,最优的制度解决是通过设计特定的行政结构和程序来实施事前控制,即通过设计那些官僚机构在决策中必须遵循的行政结构与程序,进而将议会的政治控制强有力但是隐蔽地放进了官僚机构的制度环境中(McCubbins, Noll & Weingast, 1987, 1989)。事后影响交易费用模型则强调目前在职的议会及政治家可以运用某些机制事后监督官僚机构。马寇宾斯和施瓦茨(McCubbins & Schwartz, 1984)研究了两种非常重要的监督方式:警察巡逻和火警。警察巡逻的监督方式涉及具体的、经常性的巡视、探查和汇报等直接监督方式。然而,这种监督方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在实践中很少实行这样的监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官僚机构可以脱离它们的委托人的制约。因为政治委托人可以建立类似“火警”(fire alarms)的监督机制来制约和控制官僚机构。所谓“火警”机制是指当选民和利益集团感到他们的利益被官僚机构伤害时,他们就会向政治委托人大声呼吁。此时,委托人就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关于官僚机构行为的信息。“火警”机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将道德风险引起的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机制。因为,一旦官僚机构认识到这种“火警”机制的存在,它们就会考虑和执行委托人制定的政策。

议会是如何作出授权决策的? 无论是官僚支配理论还是议会支配理论都假设议会只关心限制和控制官僚机构的行为。然而,这种假设是不对的。议员真正关心的是在授予官僚机构太多的自由裁量权和过分地约束官僚机构之间寻找一个均衡点(Epstein & O'Halloran, 1999, p. 27)。在现实中,在某些政策领域议会将相当广泛的权力授予官僚机构而在另一些领域则不授权或者只是授予很少的权力。那么,如何解释议会的授权决策呢?

艾伯斯顿和欧霍洛伦(Epstein & O'Halloran, 1999)最近发展出了一个关于议会授权的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议会的授权决策与企业的“自己制造或购买”决策是非常相似的。具体地,议会在决定是否授权以及授予多少权力时,通常要在两种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一是运用议会内部的委员会体系来制定政策的内部生产成本,二是授权的外在成本。议会自己制定政策的内部生产成本包括制定政策所需的信息成本,超级多数票原则对于速度和灵活性的限制,以及议员之间的互相投票导致的额外成本。如果将政策制定的权力授予官僚机构,又会产生其它的成本,因为官僚会有不同于政治委托人的目标和动机,从而产生所谓的代理成本。因此,两种选择都是有成本的。在某些情况下,某种选择将比另一种选择相对地具有成本效率。概言之,“在那些议会过程比官僚决策过程效率较低的政策领域,议员将把实质性的自由裁量权让给官僚机构”。

如何有效地克服政治机会主义? 正如经济市场上存在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一样,政治市场上也存在各种机会主义。然而,在政治学中,一直没有一个比较成功的政治机会主义的理论。作为一门非常强调机会主义的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理论构建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进行的研究着重分析政治机会主义是如何影响政治市场上的制度设计的。

弗朗特(Frant, 1996)认为,正如经济市场上过高的激励(利润)会导致机会主义一样,在政治市场上,过高的激励

(再次当选)也会导致政治家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种政治机会主义主要体现在政治承诺的不可靠性之上。这种承诺的不可靠性主要是由于任期的限制(即政治产权不确定性)引起的,这种政治不确定性使得现有的作出承诺的政治家及其政治联盟并不一定是将来决定政策的政治联盟。一旦将来控制政策制定的政治联盟推翻或修改现有的政策,政治家对于选民的政治承诺就不是可靠的,从而危及政治家的政治声誉。为了使他们的政治承诺在选民看来是可靠的,政治家会选择一些制度安排来约束未来的政治联盟改变以前的政策的企图。例如,通过设计行政程序来限制他们自己进而限制未来的政治家对于官僚机构决策的影响。在弗朗特看来,正如在经济市场上将交易“非市场化”是一种有效地克服高激励引起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方式一样,在政治市场上,将某些政治交易“非政治化”是一种有效的方式。霍恩(Horn,1995)也认为,许多现代政府制度都是政治家为了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承诺的不可靠性问题而设计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治家们情愿放弃他们对于官僚机构的影响:使得官僚机构的许多决策都从政治控制中分离出来,不受政治影响,例如在官员的任命、提拔等。这些研究都有助于我们认识政治制度是如何设计来克服政治机会主义的。

在预算领域,派特歇克(Patashnik)做了同样的探索。在分析了预算交易的特征和预算中的治理结构的特征后,派特歇克(1996)在预算领域得出了一个标准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结论:预算交易有着不同的特征,因而需要不同的治理结构;同时,预算中的治理结构有着不同的绩效特征。这就意味着在预算制度的设计中必须进行“区别性组合”(discriminating alignment)。他最后结论说:协商和实施预算合同的交易费用决定了预算过程的设计;在预算领域,政治决策者有意地设计制度性的防备措施来为他们的政治承诺增加持续性。最近,派特歇克(2001)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解释了美国预算中存在的各种信托基金。他认为,和所有的合同一样,预算合同的核心就是各种预算承诺的可靠性。在公共预算中,政治产权的不确定性使得预算合同中包含的承诺的可靠性无法保证。这种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了政治家做出预算承诺的交易费用。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就会运用各种信托基金来操纵协商一个可接受的预算合同的事前交易费用,或者是确保承诺的利益对于选民来说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的事后交易费用。

议会内部为什么会发展出委员会体制?传统政治学关于国会内部组织结构的研究一般是描述性的,而公共选择理论一般忽略了议会内部的组织机构的重要性,只是简单地假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议员会在议会内部进行选票交易(一种市场型的交易)。因此,都没有回答为什么议会内部的政治交易是以一种“非市场的”形式出现的。

温加斯特和马歇尔(Weingast & Marshall,1988)构建了一个交易费用模型来解释国会内部的组织结构。他们认为,以前的研究都是市场机制导向的,它们都隐含着假定,在议会内部的政治市场上进行的交易是能够顺利进行的。这种建立在市场逻辑上的分析假定掉了一些影响着议会内部的政治交易的深层次问题,两个非常重要的变量被当成了外生变量:政治交易的时间维度和政治合同的实施。首先,政治市场上的交易涉及非同时期的收益流。由于现在的议员不能约束以后当权的议员的行动,因此,将来的议员会修改、取消或者忽略以前的政治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交易产生的收益就无法延续到以后的立法阶段。其次,政治市场上的交易是非同时进行的交易。在议会内部,不是议员A给议员B一票的支持,议员B也马上给议员A一票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交易就面临着企业理论中常见的合同风险问题。

在分析了这些合同履行的道德风险后,温加斯特和马歇尔指出,市场形式的交易机制不能确保交易的收益成为现实。他们进而认为,“正如这些问题导致纵向一体化来取代市场交换一样,它们激励了在议会内部设计取代明显的市场交换的制度”。这种制度就是委员会制度。由于议员的再次当选取决于他们为各自的选区提供的政策收益,加上选区利益是不同的,议员们在选择任职的委员会时,通常会选择那些对于他们的选区具有最大的边际影响的委员会。这样的委员会体系解决了议会内的政治交易所面临的道德风险。首先,委员会体系提供了实质性的保护来防止机会主义行为,进而为政策上的讨价还价提供了时间上的连续性。因为,在委员会体系下,由于议员们一般都控制了那些对于他们的选区利益至关重要的委员会,这就防止了他们的利益被其他的议员的违约侵害的可能。其次,委员会体系使得议员之间的政治交易制度化,将议员们对于议事日程的控制权制度化,使得议员们没有必要在一种没有承诺保证的政治市场上购买投票,从而回避了政治市场上的道德风险。他们的结论是:委员会制度为议员之间的政治交易提供了实施机制。当议会内部存在着特定的讨价还价问题时,某种“非市场交易”的形式比市场交易更具有优越性。

为什么有些公共服务只能在公共官僚机构内部生产?在其名著“官僚制”中,政治学家威尔逊(Wilson,1989)提出了一个对于交易费用理论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一些公共服务(如外交)必须在政府内部生产而不能向私人部门购买?十年后,著名交易费用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9)专门回答了这个问题“威尔逊问题”。威廉

姆森认为,公共部门的交易主要有六种类型:购买型、再分配型、管制型、主权型、司法型、基础设施型交易。威廉姆森主要分析了主权型交易(外交)。他指出,这种交易必须面对三种合同风险:资产专用性、诚实风险和营运成本。威廉姆森批评了莫(Moe,1990)关于资产专用性不适用于公共部门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只对于公共部门的物质资本是正确的,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本(如外交事务中形成的人力资本)则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不过,威廉姆森认为,真正使外交事务等主权型交易区别于其它交易之处是“诚实的风险”。比如当行政首脑(如总统)对于某个外交事务的供给机构提供的信息和评估不信任时,诚实的风险就会产生。威廉姆森认为,在主权型交易中产生合同风险的程度以诚实的风险最大,资产专用性引起一些,营运成本引起的最小。正是由于这三种合同的风险,尤其是诚实的风险,使得主权型交易不能私有化,而必须由政府自行生产。威廉姆森结论说,和其它的治理结构一样,公共官僚特别适合于某些类型的交易而不适合于另一些类型的交易。公共官僚作为一种治理结构有其效率的一面。这是完全不同于公共选择所得出的公共官僚是低效率的简单结论,丰富了我们对于公共官僚的复杂性的了解。

如何评价政治市场的效率?1990年,诺斯(North)分析了政治市场上交易费用产生的源泉。他发现,由于存在信息成本、决策者用来解释他们的环境的“主观模型”的局限以及合同实施的不完全,政治市场上的交易费用通常都很高。因而,政治市场就是非常不完善和低效率的。1996年,经济学家迪克塞特(Dixit)进一步发展了诺斯的交易费用政治学,建立了一个用来解释经济政策制定的交易费用政治模型。和诺斯一样,迪克塞特也认为政治市场比经济市场更加容易为交易费用所困扰,因而是低效率的。迪克塞特还认为,一般性地假定政治市场的低效率将为我们研究政治中的交易费用提供一个非常有用的出发点。

然而,其他的研究者倾向于对此表示怀疑(Vira,1997;Bartle & Ma,2001)。例如,在讨论所谓的“政治科斯定理”时,范纳(Vira)就批评说:“新古典制度主义过分关注于以降低政治交易费用作为促使社会希望的制度变迁出现的策略”。在他们看来,在政治领域,效率可能不是唯一的和最高的标准。因此,在政治市场上有时制度设计者要有意地增加政治交易的交易费用。

为什么国家之间会采取不同的合作形式?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为什么国家之间会采取不同的合作形式这个问题一直未能获得充分的关注和很好的解释。最近,一些研究者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对此进行了比较有价值的解释。1996年,雷克(Lake)运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在国家安全的生产中为什么有一些国家采取了相对松散的合作形式而另一些国家采取了层级制的合作形式。雷克指出,在生产国家安全的过程中,国家必须与其它的国家交往,因而必须选择某种关系形式来治理它与其它相关联的国家的交往,该关系形式可以是混乱和松散的联盟,也可以是层级制的帝国,或者是介于其间的任何形式(如保护国和非正式的帝国)。他认为,机会主义的预期成本和治理成本决定了国家在各种关系形式之间的选择。机会主义的预期成本将随着层级制的运用而降低,治理成本则会随着层级制的运用而增加。最近,雷克(1999)运用该理论来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他指出,联合生产经济、机会主义的预期成本和治理成本决定了在单边主义和合作以及在安全合作的各种形式之间的选择。

2000年,韦伯(Weber)发展了一个国际关系的交易费用理论,用来解释为什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会选择某种形式的合作。韦伯的模型用两个关键性变量来解释各个国家选择的层级制的安全结构的类型:外在威胁的程度和交易费用。该模型假设外部威胁越大,国家的安定需求越大,也越愿意放弃某些行动的自由,此时,国家进入一种约束性的安排的可能性也越大。同时,交易费用越高,国家倾向于一种更加有约束性的安排的可能性越大。韦伯进而用这个交易费用模型来解释和推断国家的安全形式的选择。

交易费用政治学的有效性及其贡献

在评价交易费用政治学时,我们所面对的第一问题是:交易费用经济学是否能用来分析政治问题?正如交易费用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指出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交易及其合同,任何能够描述成为合同问题的关系都可以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认为,政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交易,这些政治交易都是可以从合同的角度来考察的。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种合同关系,政治家(议会或行政首脑)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视为一种合同关系,政治家之间的政治交易也可以视为一种合同关系。事实上,

其他学者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超国家的政治实体(Sandier & Cauley,1977;Keohane,1984)。他们都倾向于将这些超国家的政治实体视为约束国家间交易的机会主义、降低交易费用的机制。

许多交易费用政治学的研究者都已经明确地提出政治合同的概念。例如,派特歇克(2001)就认为预算是一系列的合同,预算活动就是一个形成预算合同并确保预算合同实施的过程。国际关系学家雷克(1996年)指出的,“国际关系总体上可以视为隐性合同和显性合同之下的交易网络”。换句话说,国际关系作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国家之间的合同关系,有时国家之间的交易是通过明确的合同(如条约)来组织的,有时却没有明确的合同。在政治交易中,相当部分的政治合同都是隐性合同。这种隐性合同有时是一种口头承诺,有时甚至只是一种默契。政治合同的这种特性使得政治合同的制定和实施都会面临巨大的交易费用问题,主要是制定合同时的高昂的信息成本、决策成本,以及合同实施的风险。这些交易费用问题(合同问题)都会影响到政治交易以及政治制度的设计。因此,交易费用理论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政治问题的框架。

其实,自公共选择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产生以来,政治交易和政治市场的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尽管从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同意私人市场上存在交易费用,在80年代以前,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政治市场上的交易费用尤其是这种交易费用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影响。布坎南和图洛克(Buchanan & Tullock, 1962)在讨论投票规则的选择时,分析了讨价还价的成本等决策成本。这些决策成本实际上都可以包括进交易费用之中。而且,从整个分析框架上看,布坎南和图洛克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科斯教授的交易费用理论的启发。但是,这种分析显然不能属于交易费用政治学的范畴。因为,正如琼斯和胡德森(Jones & Hudson, 1998)批评说,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过程当作理性决策者进行政治交易的“政治市场”,但是,政治市场上存在的交易费用以及被用来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被忽略了。当然,对于交易费用政治学来说,关键的分析概念是政治交易与政治合同以及交易费用问题,而不是政治市场。因为,市场只是用来组织各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易的一种方式,许多交易都是在“非市场”的结构中进行的,例如,家庭内的交易与政治交易。正如本文的文献评估发现的,在政治领域中,许多政治交易最后都有意识地采取了“非市场”的形式来组织,例如国会内的政治交易。

为了更好地理解交易费用政治学的贡献,有必要简单地分析一下政治分析中的理性选择模型,尤其是它在实证理论上的失败。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唐斯(Downs, 1957)、布坎南和图洛克(Buchanan & Tullock, 1962)等人的开创性研究,公共选择学派正式出现。作为一种关于政治的经济理论,公共选择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颖的分析政治问题的角度。但是,对于许多熟悉政治领域中的经验事实的政治学家来说,理性选择政治理论的很多漂亮的实证理论都是不可信的。1994年,格林和夏皮罗(Green & Shapiro)对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们指出,公共选择没有为它的实证理论的结论提供经验事实的支持。公共选择学者缪勒(Muller, 2001)也承认,格林和夏皮罗的批评基本是成立的。实际上,缪勒自己一直也是这样批评公共选择的。在他看来,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在规范理论上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在实证理论上却是失败的。公共选择理论家着迷于理性选择模型的精致与严谨,从而牺牲了理论对于现实中存在的行为的解释能力(Muller, 1986, 2001)。例如,唐斯的选民投票理论是与现实不一致的(Jones & Hudson, 1998)。另外,30多年来积累起来的经验检验都发现公共选择的尼斯堪南模型只能解释非常少的官僚行为,在许多情况下,官僚并不追求预算最大化或者不能成功地实现预算最大化(Blais & Dion, 1991)。

正如本文的文献评估发现的,在许多方面,交易费用政治学都弥补了理性选择模型的缺点和不足。早期的理性选择模型之所以在实证理论上失败,主要是因为它们忽略了政治制度的作用。在这些模型中,政治制度是被当作外生变量给定的。因而,政治分析只是分析在给定的政治制度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政治行动者是如何决策和行动,而不能解释(也没有兴趣解释)这些制度是如何产生。交易费用政治学将制度分析包括进了理性选择模型中,从而,许多在传统理性选择模型那里不能解释的政治行为,现在就能得到很好的解释。例如,交易费用的政党理论发现正是由于政治过程中存在象政党这样的降低了交易费用的政治安排,所以,理性的选民也会去参加投票。交易费用的官僚控制理论发现,由于现实政治中存在各种政治委托人设计来减少代理成本的机制,所以,政治委托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官僚。

在该书中,布坎南和图洛克(1962, p. 54, gi)引用了科斯(Coase, 1937, 1960)。

最近,国内学者刘元春(2001)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整个交易费用分析框架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因为政治市场是交易经济学泛滥的产物,政治市场是一个不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所以,政治交易费用是一个不成立的概念,政治科斯定理也就没有成立的基础。然而,如果政治市场并不是交易费用政治分析必不可少的分析概念,那么,就没有理由从政治市场不具有普遍性来否定政治交易费用。最后,刘元春的分析 and 结论是建立在非常薄弱的文献评估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本文前面所评述的交易费用政治学的文献,他只涉及了诺斯(1990)和范纳(1997)的研究。而且,将公共选择与交易费用政治分析等同。

此外,交易费用政治学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政治分析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将一些以前的研究忽略的重要问题重新引入政治分析中。例如,派特歇克(2001)就指出,“虽然在法律的意义上预算‘合同’不是合同,将预算看成一系列隐性的社会合同将使我们认识到一些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就容易忽略的重要问题”。在公共预算领域,几十年来一直居于优势地位的理论是瓦尔达沃斯基(Wldavsky)在1964年建立的渐进预算模型,该模型认为由于决策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因而每年做预算决策时无论是官僚机构还是政治委托人都只关注于预算的增量部分,而不是审查全部的预算要求。派特歇克指出,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角度看,渐进预算模型实际上只是分析了形成预算合同时所需的事前交易费用,而忽略了实施预算合同必须面对的事后交易费用(1996;2001)。雷克(1996)也指出的,国际关系研究太过于关注国际关系中的混乱无序而忽略了各种层级结构的存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运用使得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者重新认识到层级结构的存在与重要性。最后,相当多的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以国际关系中的行动者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和研究重点。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理论重心的“误置”。这种误置大大地限制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运用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重新确立为国家之间的交易,使得国际关系理论能够解释目前的全球化体系中迅速变化的政治结构。

总之,正如派特歇克(1996)指出的,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交易费用理论是否适合于用来分析政治问题(例如预算决策),而是如何运用的问题。具体地,是如何将交易费用与其它的因素组织到一起来帮助理解政治交易。

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的研究领域

本文的文献评估发现,现有的交易费用政治分析仍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首先,正如早期的经济领域的制度分析主要关注制度的有效率的一面那样,目前的交易费用政治分析也是主要局限于政治制度的有效率的一面。这种分析有两个问题:1)如何解释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机会主义行为;2)政治领域的竞争是否充分到能够引导政治家去设计降低交易费用的政治制度。例如,在交易费用政治模型中,政治家之所以致力于通过设计和实施特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政治承诺的不可靠性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在长期的政治交易中选民可以判别出承诺可靠的政治家和承诺不可靠的政治家,并惩罚后者(Horn,1996;Patashnik,2001)。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尤其在政治家对于再次当选并不担忧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在发达的民主政治中也是可能的,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中则更为普遍),政治家设计某种增加政治承诺可靠性的制度的动机就会很弱,政治承诺就会非常不可靠。

其次,现有的交易费用政治分析几乎都集中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尤其是美国的政治体系,这就为理论建构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这样的理论只是建立在有限的经验事实的支持之上的,理论本身的概括度也就受到了限制。如果将政治制度安排视为交易费用政治模型中的因变量而交易费用或者引起交易费用的那些因素视为自变量的话,那么,这种从有限的经验事实推导出来的理论模型实际上要么将某些自变量当成了常数,要么将因变量当成了常数。例如,莫(1990)提出的政治产权的不确定性在许多的交易费用政治模型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变量(或解释性变量)。现在的问题是,虽然政治产权的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关于美国政治特征的概括,但在其它的政治体系中,例如在一党专制的政治体系中,政治产权就是确定的。而在这两者之间又存在其它的政治体系,政治产权将介于确定性和不确定之间。这就意味着在运用政治不确定性来解释制度安排的选择时,模型的自变量实际上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常数。就政治制度这一方面而言,它也应是一个变量。然而,它也是被当成了一个常数。例如,在交易费用政治理论之前,对于官僚的政治控制被视为一个常数:政治委托人无法控制官僚;现在,在交易费用的“议会支配”理论中,它又被当成另外一个常数:政治委托人可以控制官僚。正如胡玻和西朋(Huber & Shipan,2000)最近指出的,政治委托人对于官僚的控制应该被看成一个变量。在不同的政治市场,政治委托人对于官僚的控制不仅有程度上的变化,而且有手段上的变化。

第三,现有的交易费用政治分析都是以效率为标准的,因而都集中分析政治制度如何将交易费用最小化。虽然在经济领域运用效率标准基本上是争议不大的,但在政治分析中完全关注于效率标准则不能不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在政治领域中,很多政治制度最初的设计动机都是非效率的,例如正义与平等。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交易费用政治学中到底是应该遵循交易费用最小化的逻辑还是交易费用最大化的逻辑(Vira,1997;Bartle & Ma,2001)。从激进经济学的角度看,政治交易费用最小化也是存在问题的(刘元春,2001)。

最后,现有的文献实际上指出了,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运用交易费用理论的框架来分析政治问题:以交易费用作为关键概念的分析、以低程度和高程度的激励为核心的分析、以合同为核心的分析。例如,弗朗特(Frant,1996)就

主张,当我们将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运用来分析政治和公共部门的问题时,关键的概念就不应该是交易费用,而是低强度和高强度的激励。在威廉姆森(1999)和温加斯特(Weingast & Marshall,1988)看来,关键的概念应该是交易与合同。然而,对于其他的研究者来说,交易费用仍然是一个核心的变量(Jones & Hudson,1998; Epstein & O'Halloran,1999)。本文前面的分析主张将政治交易、政治合同与交易费用共同作为交易费用政治学的关键性分析概念。对于交易费用政治学未来的发展来说,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

这些存在的问题都是交易费用政治学在未来必须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此外,由于交易费用政治学的研究刚刚起步,还有许多政治学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都可以用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来重新审视。例如,交易费用政治学有助于发现国家的最优规模。怀特曼(Wittman,1991)构建了一个这样的模型来理解民族国家的整合与分离。他将国家之间的交往视为某种市场型的交易,因而存在“国家间的交易费用”。国家之间的合并将会降低国家间的交易费用。但是,这种合并将会增加“国家内的交易费用”。在怀特曼的理论框架中,这两种交易费用的权衡加上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考虑将决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是否会联合(或分离),进而决定国家的规模。然而,怀特曼的模型还比较简单,有待进一步的拓展。交易费用政治学还可以用来解释一个被忽略但是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都是以民族国家作为主要的组织单位?从交易费用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种能够将制定和实施政治合同的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组织。因为,当存在多民族而且各民族之间区别很大,并且无法形成一个占有绝对优势的民族时,制定政治合同的交易费用将会很高,而且,没有任何一方会真正遵守合同。交易费用政治学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中国政治的框架。比如,可以用来分析执政党对于政府官僚机构的控制,中央对于地方官僚的控制。

结论

毫无疑问,交易费用政治学已经出现。它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于政治领域的交易及其制度的理解,弥补了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不足。但是,作为一个新兴起的研究领域,它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为了进一步推动交易费用政治学的发展,必须关注政治制度的非效率的一面,并将交易费用政治学的研究放到更加广阔的经验世界中去,充分利用比较政治学累积起来的资料与数据,从而建立起概括范围更广、概括程度更高的理论。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交易费用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有赖于在政治学家和交易费用经济学家之间形成某种积极和有建设性的对话与沟通。对于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政治学家应该更加开放,而不能因为反对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而拒绝经济学的理论。而经济学家也应该充分尊重和有效利用政治学累积起来的资料与理论。实际上,在交易费用政治学中,目前已经出现了这种“积极”的对话与沟通,例如,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9)和迪克塞特(Dixit,1996)的交易费用政治分析就是建立在政治学家威尔逊(1989)的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参考文献

- 刘元春,2001: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科学出版社。
- Aldrich, John. 1997, When is it rational to vote? In Dennis Muller. 1997. Eds. Perspectives on Public Cho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73—390.
- Bartle, John & Jun Ma. 2001, Applying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to Public Budgeting and Finance, In John Bartle. Eds. 2001. Evolving Theories of Public Budgeting. New York: JAI Press.
- Blais, Andre and Dion, Stephane. Eds. 1991, The Budget-maximizing Bureaucrat: Appraisals and evidenc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Buchanan, James & Gordon Tullock. 1962.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Dixit, A, 1996,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Epstein, D. & S. O'Halloran, 1999, Delegating Po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ant, Howard, 1996, High-powered and Low-powered Incentives in the Public Sector,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 6, No. 3 (July): 365—81.
- Green, D. & L. Shapiro, 1994, The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om, Murray J, 199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ber, J. & C. Shipan, 2000, The Costs of Control.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Vol. XXV: 25—52.

- Jones, P. & J. Hudson, 1998, The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Public Choice* Vol. 94: 175—489.
- Keohane, Robert, 1984.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ke, David. 1996. Anarchy hierarchy, and the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Winter) :1—33.
- 1999. *Entangling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oe, Terry, 1984, The New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8:739—777.
- 1990, Politic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Vol. 6: 213—253.
- Mullef Dennis, 1986. Rational Egoism Versus Adaptive Egoism as Fundamental Postulate for a Descriptive Theory of Human Behavior. *Public Choice* Vol. 51: 3—23.
- 2001, Public choice after 50 years, Bruno Frey after 60. *KYLOS* Vol. 54: 343—354.
- McCubbins, M., R. Noll & Barry Weingast. 1987.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s Instruments of Political Control,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Vol. 3: 243—277.
- 1989, Structure and Process, Politics and Polic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75: 431—482.
- Niskanen, W. A. 1971.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icago: Aldine Atherton.
- 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1990, 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2: 355—367.
- Patashnik, Eric. 1996.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budgeting. *Policy Science* Vol. 29: 189—212.
- 2001, *Putting Trust in the US Budg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ndler Todd & Jon Cauley, 1977, The Design of Supranational Structur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1, No. 2 (June) : 251—276.
- Vira, B. 1997. The political Coase theorem.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 Vol. XLI: 761—779.
- Weingast, Barry 1984, The Congressional-bureaucratic System: A principal agent perspective. *Public Choice* Vol. 44:147—191.
- M. Moran. 1983. Bureaucratic Discretion or Congressional Contro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1: 765—800.
- & Marshall William. 1988.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Congres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1, No. 1: 132—163.
- Weber, Katja, 2000, *Hierarchy Amidst Anarch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Williamson, Oliver 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 1999, Public and Private Bureaucracy.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Vol. 15:306—342.
- Wilson, Jams, 1989, *Bureaucracy*; New York: Basic Book, Inc.
- Wittman, Donald, 1991, Nations and state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Disolutions and Divorce.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81, No. 2.

(责任编辑:黎明)(校对:子璇)

(上接 61 页)

- Harvey, A. C. ,1987, "Applications of the Kalman Filter in Econometrics", in T. F. Bewley (ed.) , *Advances in econometrics: fifth world congress*, *Econometric Society Monograph* N. 1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urence. M. 1986, "Weak Form Efficiency in the Kuala Lumpur and Singapore Stock Market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0, 431—445.
- Li Xiaoming, 2001, "China's Evolving Market Efficiency Reconsidered: The Kalman Filter Analysis", Massey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 Lo, A. W. and A. C. MacKinlay, 1988, "Stock Market Prices Do Not Follow Random Walks: Evidence from a Simple Specification Test",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41—66.
- Fama, Eugene F. ,1965, "The Behavior of Stock-Market Prices", *Journal of Business* ,38, 34—105.
- Fama, E. F. ,1970,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Work", *Journal of Finance* ,25(2) ,283—417.
- Fama, E. F. ,1998, "Market Efficiency, Long-term Returns, and Behavioral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49(September) ,283—306.
- Rockinger, M. and G. Urga, 1998, "A Time Varying Parameter Model to Test for Predictability and Integration in Stock Markets of Transition Economies", D. P. N. 09—98, Centre for Economic Forecasting London Business School.
- Rockinger, M. and G. Urga, 2000, "The Evolution of Stock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8(3) ,456—472.
- Stephen F. LeRoy, 1989,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nd Martingal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7, 1583—1621.
- William F. Sharpe, Gordon J. Alexander and Jeffy V. Bailey, 1999, *Investments* (6th edition) ,Prentice-Hall, Inc.
- Zalewska-Mitura, A. and S. Hall, 1998, "Examining the First Stages of Market Performance: A Test for Evolving Market Efficiency", D. P. N. 11—98, London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责任编辑:晓喻)(校对:林)

An Evolving Market Efficiency Test On Chinese Stock Market

Zhang Bing & Li Xiaoming

(Nanjing University ; Massey University , New Zealand)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method to detect changes of weak form efficiency in Chinese stock market —evolving market efficiency test ,which is very suitable for emerging market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Our test involves a system consisting of a time-varying AR(2) model and an asymmetric TARARCH equation. Together with the findings of year-by-year test ,we confirm that Chinese stock market has been weak form efficiency since 1997.

Key Words : Evolving market efficiency ; Market efficiency ; Martingale ; Weak form efficiency

JEL Classification : C320 , E440 , G140

South Imitation , Entrepreneurship and Long Run Growth

Zhuang Ziyin

(Wuhan University)

This paper develops a dynamic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in the framework of South-North trade system ,where the southern imitative entrepreneurs is the key factor of economic growth. Further more ,we emphasize the effects of degre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 the southern imitation. In our model ,the economies with more entrepreneurs have faster growth rates than those economies with less entrepreneurs. This paper 's policy implication is apparent ,the policies which affect amount and activities of entrepreneur ,and relativ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will have effects on growth rates.

Key Words : South Imitation ; Entrepreneurship ; Long Run Growth

JEL Classification : O120 , F470 , J410

The High Equilibrium Trap ——The Needham Paradox Revisited

Yao Yang

(CCER , Peki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Needham Paradox in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It shows that the drast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pulation-resource endowments of China and Western Europe is the key factor that drives the civilization diversification between those two regions. This theory is consistent with Mark Elvin 's ' high equilibrium trap ' theory. However ,it improves on Elvin 's theory by correcting its inconsistencies and identifying two key factors ,scale economies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and Malthusian population growth. they are necessary to created the ' high equilibrium trap ' .

Key Words : The Needham Paradox ;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 economic growth

JEL Classification : N150 , O110

Transaction Cost Politics :the State and future

Ma Jun

(Zhongshan University)

Since the 1980s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CE) has been applied to political issues. Transaction Cost Politics (TCP) has been appeared. TCP has greatly helped to correct weaknesses of former rational choice political models ,at the core of which lies public choice theory. Despite the growth of this body of literature ,no critical and complete review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m even in English academy. Therefore ,it is very useful for us to first review this body of literature in Chinese academy ,which would help to enhance studies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in China.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major studies and their findings in TCP. Next ,this paper addresses why TCE can be applied to politics.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problems TCP is facing and future research areas in TCP.

Key Words : Transaction Cost ; politics ; institutional analysis

JEL Classification : D230 , D720 , D730 , D780 , D790